



回答听众提问

■ 黄修己：福建福州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至1987年留校任教，1987年9月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于2005年退休。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编著有《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百年中华文学史话》、《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赵树理评传》、《赵树理研究》、《不平坦的路》、《张爱玲名作欣赏》以及数篇论文和评论，著有散文集《我的“三角角”》。近日，黄修己教授的论文《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获第三屆“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二等奖。

戴着方框眼镜的黄修己教授笑盈盈地把我们迎进了客厅，两杯泡好的茉莉花茶放在客厅中间沉香色的茶几上。黄教授自我介绍：“我最爱家乡的茉莉花茶。”他边说着边把风扇摆好在我们的座位前，“你们说想听我讲讲治学的故事，把治学讲成故事，不好讲的。不过我努力讲得具体些吧。”他为我们着想，几句亲切的话让我们觉得他是中文系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是名字常出现在学术著作版权页上的学者，但此时更像是位愿意给我们讲故事的可亲可爱的老爷爷。

动荡岁月自持不怠，求知路上壮志不移

好学的小兵

“在紧张的军旅生活中还要紧张学习，但对我来说能学到新的知识又是很快乐的。”

我们访问黄教授时，今年的高考正在进行。谈起高考他感慨万千，因为他14岁初中毕业即参军，5年军旅生活酿出他的作家梦，便报名参加1955年的高考。只是学历不够，信心不足，索性填报个最难考的学校。有趣的是，在考场外碰上已经转业在某名牌中学做教导主任的战友。这位战友鼓励他：“你一定能考上！”并指了指她带领的学生说：“我了解他们，你比他们强多了。”果不其然，黄教授高考一举中魁，入了北大。这位战友能够言中，是因为曾经的共事使她看到黄修己还是个小兵时，已经展现出对求知欲的渴望。当时《人民日报》专发社论，要求“为健康使用祖国语言而奋斗”，并介绍人们学习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黄修己得迷入迷，这给了他在语言上锤炼“火眼金睛”的契机和平台，对他日常语言里的语法问题比常人更敏感了。学完了吕、朱的《语法》，又自学黎锦熙的《国语文法》和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还找了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来读，从而扎实地训练了他的语法分析能力，过好了文字表达这一关。

颇好读书的黄修己还自己订阅了四本杂志：《文艺学习》、

“将治学视为生命”

—专访中国语言文学系黄修己教授

■ 本报记者王安浙 何超

《语文学习》、《旅行家》和《美术》。前两刊为黄提供专业营养。有一篇文章讲到高尔基曾说过，现实主义作家隔墙听人谈话，虽不见其人也能从其语言捕捉到他的性格特征。此后黄就很留意身边人的言谈，晚上就做札记，记下那些个性化的语言，并且养成了分析人的习惯。后两本则拓展了他的兴趣，他说，“爱看《美术》纯是个人兴趣，但对我学文学也有帮助。那时学苏联，介绍很多俄苏的画家，如列宾、苏里科夫等。一幅《伏尔加河纤夫》，拉纤的行列里，从老头到小孩，细细品味都可据其姿态、神情、装束等看出他们的不同境遇、情绪和生活状态，每个形象里都有丰富的历史、思想的含蕴。这对我们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也是很有启发的吗？”

在紧张的军旅生活中还要紧张学习，但对黄修己来说能学到新的知识又是很快乐的。他说他的优点之处是绝不为了应考而学，而是自主地按着自己的意愿、兴趣来学习，再紧张也是自己所喜欢的，目的只在培养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所以事半功倍，提高很快。更重要的是从年轻时候，就养成了好学的习惯，此后坚持了一生。

校园里的苦学人

“我们身上有一种‘开国气象’，对前途的美好憧憬和信心。既然在学术的岗位上，治学就不仅是职业，更是志业。”

后来作家梦没有做成，系主任宣布“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此后按照中文系的教学计划去学，学术研究便陪伴了黄教授六十年的光景。他和同窗思想都扭转得快，因为做学问和搞创作并不矛盾，自古以来身兼学者与作家的多多。他还在坚持做札记，一方面学习分析作品中的人物，一方面留心观察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偶尔也写写诗歌、散文投给刊物。直到文革爆发，看到当时的形势，心想再也搞不出创作了，才死了写小说之心，把往日的札记全都当破烂卖掉，得了两块钱买糖吃了，此后一心一意做研究。

黄修己求学、治学的年代，从反右、三年困难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正是国家最为动荡时期。求学、治学肯定都受到严重的冲击；但这都没有损伤他刻苦勤学的意志。黄教授回忆说，“我和同学们那时对学习都充满激情，也非常刻苦。或许因为我们生于战乱，我还尝过做亡国奴的滋味，所以一心渴望祖国强大，感到匹夫有责，上大学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我们身上有一种‘开国气象’，一个国家新生之际的兴奋，对前途的美好憧憬和信心。既然在学术的岗位上，治学就不仅是职业，更是志业。”彼时的他和同学们对于读书都是分秒必争，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起床赶到图书馆门口排队占位。排队买饭时，也利用这点时间背外语单词。直到晚上十点，学校统一熄灯了，只有楼道、盥洗室里还亮着灯，一些人就凑在那里看书。

“逍遥派”其实不逍遥

“有人活着为学问，有人学问为活着。活着为学问的人，只要还活着，他就会去探求，去思考，去发现。环境再恶劣也不会放弃。”

直到文革的暴风雨袭来，已经治学无路了，但只要还有一点机会他也不会放弃。他回忆那段生活：

“我代王瑶先生讲过一次课，讲的是赵树理。后来讲稿整理成小册子出版了。正好是文革前夕，文艺界大批‘写中间人物’论，赵树理是代表人物，我就有了吹捧‘写中间人物’论的罪名。但在北大，大人物太多，轮不到我这小助教挨斗，我就成了那种一时还不是‘反革命’却也‘不准革命’的人。到后来红卫兵忙着打派仗，更顾不了我们这种人了。因此我长时间当了‘逍遥派’，我有了看书学习的时间。”文革中红卫兵焚书，黄教授却买书、读书。当然首先看马列，看毛泽东的书。同时也大量看文学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库存的书拿去卖钱，黄修己如获至宝，趁机购置了许多精装本。他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还有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现代的一些长篇小说都重读了。文革的恐慌和紧张，撼不动黄教授矢志治学之心。他笑称：“读书无用论，在我身上起不了作用。”他以读书抗乱世，阅读面很广，一些名著

以前没有时间读，这时都借来读。与现代思潮有关的，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严复的《天演论》，都是这时读的。这时的大量阅读，可以肯定地说对后来的思想解放大有帮助，也是一种准备。

对后来专业研究影响最大的，还是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泡在学校图书馆看旧期刊，以前教学紧张，没有这么多时间。馆藏许多旧期刊杂志报纸，这时除了偶尔一两个专题组的来查找“叛徒”材料，平时是没有人来光顾了，所以才有黄教授说的三个馆员陪他一个读者的场景。这段阅读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现代文学史资料。“看这些旧报刊，可以看到许多现代作品发表的背景，寻路也看些其他学科的文章，连香烟广告也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增加了很多对旧社会的感性认识。”时间长了，跟几个馆员熟了，他们就允许黄教授入库搬报刊来看，给他许多方便。那时还没有复印机，很多资料只能手抄。有一个馆员看他抄录资料很辛苦，好心地要帮助他，方法是拍照。黄对他说，我要的不是一张两张，可能要几百张，你能拍这么多吗？那位馆员无言以对。就这样，一本又一本的笔记本被他的字迹占满，至今黄教授家里还堆放着一摞摞的旧笔记本。一笔一划间他写尽了每一个晨昏，一摞摞的记录本也丈量了年岁的刻度。

2004年9月的《文学评论》用首篇的位置发表了黄修己教授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篇论文后来荣获第三届“王瑶学术奖”。人们大概不会想到这篇论文的44条注释、引文，除了两条新的，其他都是黄教授在“文革”期间一条一条抄录、积累的。黄教授说：“那时是无心的，只是为了积累资料，哪敢存有一分写论文的妄想。幸亏功夫不负‘无心’人，怎么也没想到几十年后竟都用上了。”

黄修己教授潜心求学、治学已然近60个年头，坐着康乐园的杜鹃也红了26回。走过漫漫治学路，他的感悟是：有活着为学问的，有学问为活着的。前一种人只要还活着，他就会去探求，去思考，去发现。环境再恶劣也不轻易放弃。因为治学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求真觅底常加反思，调整观念拓殖新境

黄修己教授研究现代文学史，能够保持一种审视和反思的态度。他的勤奋刻苦也表现在勤于思索，不停地探求、发现上。

“身作之史”和“心构之史”

“如实地讲出追求历史真实的艰难不易，是为了激发大家用更高的热情去追求，去探寻，去逼近历史的真实。”

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可谓增删数次，批阅多载。为何他对修改文学史如此孜孜以求？甚至退休了还朝思暮想着修改第四版的《发展史》？

1960年，还是北大学生的黄教授参与编写现代文学史的试用本。这是他第一次参与这项工作。“当时是拿着放大镜找李大钊，找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学主张，不惜断章取义，尽力拔高。那时谁去理睬沈从文？有人根本就不知道张爱玲是谁。”黄教授回想起来当时编写的教材，对比今天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差别之大不妨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他自己从参编北大“试用本”，到独立写出《现代文学简史》，到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再到最近的《发展史》第三版，也在“天翻地覆”。他说，“这使我明白历史书里谁上谁下，往往是在现实中谁上谁下的反映。”这一份冲击和感悟触动黄教授写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势大于人》一文，也成为他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的初衷。他从自己的科研实践中，体会到了有必要清晰地区别“历史”概念含有的两个不同内涵：历史既指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是客观的，不可改变了的；历史也指后人记录下来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中外各种历史著作，这是人的精神产品，是主观的。所谓多变，所谓可以像小姑娘一样任人打扮，就是指这一种，应该称为“史著”、“史书”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变动，人的认识的变化，这种历史也就不断地变。黄教授借用严复的话，把前者称为“身作之史”，把后者称为“心构之史”。“心构之史”的不断变动是必然的，加上认识“身作之史”原貌的困难，所以追求历史真实性是非常不易的。如实地讲出追求历史真实的艰难不易，是为了激发大家用更高的热情去追求，去探寻，去逼近历史的真实。这是文学史家的天职，他们的光荣职责。经过认真的学习、思考，12载后思想的更新和发散促成了《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的出版，对现代文学史为什么会“翻天覆地”给出自己的回答。

中国现代文学的双线论

“应该先看历史是什么样的，如果事实与自己的观念有矛盾，应该调整的是自己的观念。”

近几年黄修己教授跟踪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促使他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双线论。何为双线论？他认为18、19世纪之交我国文学开始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是通过两条路线。一条主要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发动文学革命，批判旧传统，创造新形式，诞生了五四新文学。这条线上的人物，如胡适、鲁迅等就是新文学的先驱。我们现在讲现代文学主要就是讲他们开创的这条线。但是要看到还有一条线，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学，如章回体小说、诗词、戏曲等，也受到了国内外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也在向现代转型，但不采用“文学革命”的做法，在五四以后也有很大的发展。虽然用的主要还是传统的形式，却已经不是旧文学，而是另一类型的、与自己的民族传统联系密切的现代文学。但新文学先驱们一直不承认，把它当作旧文学来批判，使得至今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只有新文学一条线，我们实际上只编了半部现代文学史。这新见解目前在研究界尚未成为共识。黄教授认为目前的问题是“有的人头脑里往往有个先验的观念，遮蔽了事实，明摆着的事实也看不见，不承认。应该先看历史是什么样的，如果事实与自己的观念有矛盾，应该调整的是自己的观念。”黄教授举出戏剧为例，说不少人以为中国现代戏剧就是话剧，这是很片面的。五四后现代舞台上除了话剧这舶来品，上演的大多还是民族传统戏曲，如京剧、越剧等。现代戏剧应该是话剧、改编戏曲、新编戏曲的“三足鼎立”。一些古代传统剧目经过现代人的编演，加入了现代元素，得到推陈出新，已经不再是古典文学，是属于现代的创作。时值端午，黄教授给我们讲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许仙和白娘子当然是古代的故事，而真正把这个千古流传的故事在舞台上经典化的，却是现代人田汉。他的京剧《白蛇传》成了今日各剧组演出的蓝本。这个故事从古代的人与妖斗，人斗不过妖就请出神来帮忙，到人动摇在神与妖之间，再到了田汉，已经是妖比人和神都更美好，人性战胜了神性，人妖恋的故事已注入现代人的观念、情感和诉求，完全现代化了。田汉的京剧理所当然是现代文学，怎么能因为它保持民族传统形式就说它是旧文学？

现在要把只有新文学一条线的现代文学史，恢复为双线。黄教授感慨地说，工作量太大，自己年过古稀，做不了了。但只要有时间，他总要在讲坛上、讨论会上宣讲自己的主张。我们希望黄教授这一新的认识能早日结出丰硕的成果来。

从年轻时的好学、苦学，到退休了还不停步。几年来黄修己教授四处讲学，从东北走到海南，从北大讲到清华。他修订出版了好几部著作，还带领几位年轻的教授完成了百万言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也获得了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当我们感叹黄教授“退而不休”的精神时，他说，“老人发挥余热，也是好事，但一定要力所能及，不希望宣传‘退而不休’精神。我现在也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要树立这样的观念：人活在世上，要学习，要劳动，也要休息，休息同样是我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一路坎坷一路歌，黄教授治学六十载恰处于中国风云变化的历史年代，黄教授介绍：“除了留下一两个自己最有兴趣的题目，适当地做一些思考、积累，现在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在有生之年完成一部回忆录。这件事出乎意料的困难，因为是对自己所经历的那些年代的回顾、反思，也包括对自己的反思，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可不是轻松之事啊！”

南侧又发现一处单斜丹霞地貌。

离班戈300公里，海拔4715米至离班戈316公里（西距尼玛县不足10公里），海拔4705米处是一处丹霞地貌，也是一处单斜丹霞地貌。

2012年10月6日

星期六 晴

由革吉县城至仲巴县的仁多乡

上午9时左右，我们即乘扎西师傅驾驶的越野车离开革吉县，再看革吉县北侧正在发育的不算很典型的丹霞地貌及革吉县城东侧的丹霞地貌，在汇合口的索曲北面约7.8公里，在317国道里程碑约1865公里一带出现宽度达3公里左右的深紫红色丹霞地貌，这片丹霞地貌面积较大，是今天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一处丹霞地貌。其位置是在索县城与比如县扎拉河汇合口中间。然后，我们沿原路回到那曲县，仍宿三星宾馆。

今天考察里程达486公里，发现3.4处丹霞地貌，是这次西藏考察丹霞地貌收获较大的一天。

2012年10月3日

星期三 晴

由班戈县抵尼玛县

晨8时，在班戈县一间早餐店早餐后，即乘扎西师傅驾驶的小车赴尼玛县。在色林错（湖）南岸一带有色林错自然保护区，该处有紫红色石英砂岩残丘。离班戈211公里（地面海拔4745米），有数公里的类似丹霞地貌，形态很像丹霞地貌，但因其岩石颜色为黄色，所以是假丹霞地貌。

离班戈约226公里，有一处红色砾岩形成的丹霞地貌，岩层颇坚硬，其倾角为250度，倾角为60度，岩层面常与丹崖面一致，是一处起码有数平方公里的丹霞地貌区。

离班戈233公里，地面海拔4770米，在公路南侧又发现一处丹霞地貌，顶平，身陡，麓缓、由红色砾岩构成，此处叫麻秧乡西村。

离班戈250公里，地面海拔4855米，在公路南侧又望见一处较奇特的丹霞地貌。

离班戈252公里，地面海拔4875米，在公路

中 我的梦 征文登

法治梦，我的中国梦

■ 法学院2012级法律硕士 陈少宏

百余年来，中华民族走过了屈辱的岁月，而今坚定地迈出了独立自强的脚步。我们也实现了温饱的目标，不断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奋斗。如今，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青年憧憬着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认为是法治梦，憧憬的是一个法治的中国！

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其法治化的实现程度，是国家与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依照法律规则有条不紊地运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提到，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梦，不仅仅是法律人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

实现法治梦要有法律信仰。法律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方式，也应该成为每个公民心中的信仰，如同道德、宗教一样在人们心中形成内心的确信。“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全社会对于法治的共同信仰，是对法律的敬畏与尊重，也是对各种社会“潜规则”的鄙视与唾弃。如果没有法律的信仰，而是处处想着如何钻营法律的漏洞，如何避开法律的约束，如何打制度的擦边球，如何通过法外途径谋求不当利益，那么，社会的治理将耗费巨大的成本，也无法达到公正的社会的理想。当前国人对法律的信仰并不坚定，甚至认为法律的作用比不上领导的一个批示，常常转而寻求法外途径解决纷争，这种人治大于法治的观念加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要实现法治梦，前提是树立国人共同的法律信仰，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多元、利益博弈激烈的当前社会，法律的权威受到各种力量的挑战，国人尤其是工作在一线的司法人员，更应该坚守自己的法律信仰，坚守自己心中法律的天平，守护社会公正，捍卫法律权威。

实现法治梦要重在法的实施。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三十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来自执行。明代首辅张居正曾有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一部堂而皇之、制定得非常完美、却被束之高阁的法律文本是得不到人们的敬畏与尊重的，因为它远离了民众的生活，远离了它本应最关注的社会实践。如果说法律是一座殿堂，那么每一次法律的实行，每做出一个公正的裁判，就是为这座殿堂建筑添上一砖一瓦，这些砖瓦才是法律权威的真正来源，是法律的生命力之所在。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宪法保障人权的规定，在最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体现；我们也很欣喜地看到，不少涉及“人权案”的案件经过媒体的曝光后，得到了公允的处理；我们还看到，网络尤其是自媒体的发展，使得民众有了更多表达意愿的渠道与途径，也使得政府权力在更深入广的层面上接受社会的监督。但我们也知道，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仍要为努力奋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最好的努力便是认真对待每一个司法案件，公正的审判是法治梦鲜活的细胞。

实现法治梦需要广大青年的努力奋斗。作为法学生，虽然我们还未正式进入一线法律工作，但我们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为法治中国添砖添瓦。通过法律援助，我们为弱势群体、困难劳工送去他们最需要的维权法律服务；通过支教活动，我们为山村贫困地区的孩子送去知识也送去梦想；通过送法下乡，我们将法律的信仰、法治的理念传遍神州大地，让每一个人，无论城市人还是农村人，无论识字与不识字，都知道法律保障着我们每个人的权力。青年人如同朝日，如同初春，如同百花之萌动，如同利刃之新发，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时期，也是富于激情、乐于挑战、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岁月。为了实现法治中国的梦想，青年人应该行动起来，奉献自己的光与热！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是每一个中国人共同的梦，更是我们青年人的梦。我们迈出的每一个脚步，都将决定中国的希望；我们踏出的每一个脚印，都必须朝着梦想的方向。广大青年人行动起来，只要我们坚守法治的信仰，为了实现法治中国的梦想，携手并进，就必然能实现我们的中国梦——法治梦。

学术空间 萧捷教授专栏

西部考察日记 让世界记住中国的丹霞地貌！